

外研社学术文库·翻译研究

超越文化断裂

翻译学研究模式（I）：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爱尔兰）Maeve Olohan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图字：01-2006-1832

© Maeve Olohan and Contributor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ose of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either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or a licence permitting restricted copying issued by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90 Tottenham Court Road, London, W1P 0LP. In North America, the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222 Rosewood Drive, Danvers, MA 01923, USA.

◀ 外研社学术文库·翻译研究 ▶

First published by St James Publishing Ltd,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本书只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超越文化断裂

翻译学研究模式（I）：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爱尔兰) Maeve Olohan 编

ISBN 7-309-04000-0 定价：25.00元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2256号



出版人：董洪君
责任编辑：董洪君
封面设计：董洪君
出版发行：外研社
社址：北京
地址：北京
邮编：100081
电话：010-65255000
传真：010-65255000
网址：http://www.fltrp.co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6-1835

© Maeve Olohan and Contributors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ose of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either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or a licence permitting restricted copying issued by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CLA), 90 Tottenham Court Road, London, W1P 9HE. In North America, registered users may contact the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re (CCC): 222 Rosewood Drive, Danvers MA 01923, USA.

First published by St. Jerome Publishing Ltd.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究模式(I): 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 (爱尔兰) 奥洛汉 (Olohan, M.) 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超… II. 奥… III. 翻译理论—文集—英文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2526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王 莹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本书是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技学院讲师、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硕士课程指导教师梅芙·奥洛汉 (Maevé Olohan) 主编的一本论文集, 共收录了来自欧、美、澳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译学研究者的论文 16 篇。

这些文章之所以可以合为一集是因为他们均与赫尔基辛大学的翻译学教授安德鲁·切斯特曼 (Andrew Chesterman) 所提出的三种译学研究模式有关。切斯特曼在 1998 年曾提出过译学研究的三种模式: 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因果模式。他认为这些模式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 是一种前理论性的准备。选择了哪一种模式, 就意味着选择了哪一种研究方法, 从而也影响着最终所形成的理论样态。切斯特曼的这一模式理论对译学研究很有意义, 也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引起了不同国度译学学者的关注, 并纷纷撰文对此进行讨论。

梅芙·奥洛汉是个有心人, 她正是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才主编了这一文集, 使得一些分散的相关性研究得以集中, 从而让读者更为系统和深入地了解切斯特曼的模式理论。切斯特曼的模式理论是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示。

本书共分 16 章, 第一章是编者对本书的综述, 第二章为安德鲁·切斯特曼关于三个模式理论的论述, 其余诸章则为不同学者的分别论述。由于第一章与第二章多有重复之处, 故将第一、二章合在一起作以简述, 其余诸章再分别介绍。

一、综述

第一、二章对切斯特曼的三种模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比较模式主要用来探讨两种语言的相关性, 尤其是关注它们的相同与相似之处。通过源语与译入语的系统对比, 找出其对应关系, 并提出例证, 从而为两种语言的相似关系提出理论预设以便进行译学研究。这种研究模式旨在寻找两种语言的共性基础, 以便为可译性提供理论依据, 也为翻译实践提供方法论条件。

过程模式是一种动态模式, 它显示在时间维度所呈现出来的变化状

态, 那些对翻译过程不同阶段相关性关系感兴趣的研究者多采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切斯特曼在这里是受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式研究模式的影响。我们知道卡尔·波普尔所提出来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是问题 1(Problem1) → 尝试性理论(Tentative Theory) → 消除错误(Error Elimination) → 问题 2(Problem2)。切斯特曼则把翻译过程按单语交际与双语交际、一般过程与具体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 来运用波普尔的这一模式。

因果模式虽然在比较模式与过程模式中也有运用, 但不是主要的, 也不是很明显的。在前两种模式中, 虽然人们可以对翻译成果和过程给予描写, 但很难对这些描写和效果作出解释。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人们必然需要这第三种模式, 即因果模式。切斯特曼认为原因条件才是译入语文本效果产生的依据。他同时指出, 原因条件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 其中有译者的认知因素、译入语文本产生的环境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内容最为丰富的模式, 它甚至包括了前两种模式。

切斯特曼为了使这一模式真正名副其实, 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假设理论, 即说明假设、描写假设、解释假设和预测假设。他指出, 在这三种模式中都将包括前两种假设。但是在引入因果模式之前, 比较模式无法运用解释假设和预测假设, 而过程模式与解释假设无缘。在因果模式中, 解释假设与预测假设是通过两种不同路径被引入的。其一是通过译入语文本与原因条件的关系而被引入, 例如, 因为某种原因, 我们才认为译文应具有某些特征。其二是通过效果与翻译的关系而被引入, 例如, 某种已取得的效果是由翻译的某些特点所决定的。

由于因果模式在三种模式中最为重要, 所以切斯特曼对它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并倡导将它用于经验性翻译研究中, 用于对已有研究的系统论述和检验中, 使之成为分析翻译效果的概念工具和经验工具。同时也可以用于提出新的假设以说明原因条件与译文特征和效果之间的关系。

关于研究的方法, 切斯特曼认为主要是受研究对象所呈现方式的影响, 如是笔译还是口译。在具体文本和认知性研究中, 主要是探讨这些研究路径的下面是怎样的翻译模式在发挥着作用, 是比较模式, 还是过程模式, 抑或是因果模式等。在文本研究中, 比较模式发挥作用比较大, 因为人们免不了要将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源语和译语进行比较。而认知在过程模式中更显重要。当然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例如, 把笔译和口译作为过程来研究, 人们会把关注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应用认知过程的模式来描述创造性翻译是如何产生的。
 2. 用选择网络分析 (Choice Network Analysis) 的方法来识别和描述翻译活动中的决策点与决定采取的路径。
 3. 设计实验性经验研究方案以探讨翻译能力中的一些次级能力和它们的形成过程。
 4. 探讨在翻译教学中译入语使用源出语语言素材的优缺点。
- 用比较模式进行研究所要解决的通常是下列问题:
1. 探讨在平行语料数据库中词语创新的系统方法。
 2. 为翻译研究编写和使用语料资源的设计问题。
 3. 使用可比较的语料对译入语中出现的具体语言特征和它们在源出语中的情况进行比较。
 4. 从翻译质量评估的角度运用接受模式分析词汇接受和译文的连贯问题。

由于因果模式不是描写性的,而是讨论因果关系的,例如,“为什么译文是这样的”或“为什么人们会对译文有这样的反应”等等,所以这种模式主要讨论下面的问题:

1. 把交际中的推理范式用于翻译时所产生的研究问题。
2. 把翻译看成是一种“囚徒两难选择”式的合作形式来讨论。
3. 将合作研究中的个人构念心理运用于同声传译的研究。
4. 在对话翻译中运用交往互动的方式研究。
5. 在手势语的翻译研究中对职业道德和伦理、提倡与许可等方面的探讨。

比较模式和过程模式均可以用来描写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所以描写假设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因果关系在这两种模式中则是一种隐性的存在。

虽然这三种模式在逻辑上应该按比较、过程、因果的顺序来排列,但本文集中的文章却是按过程、比较和因果的顺序来排列的,为了使读者方便阅读,我们也按这一顺序进行介绍。

二、翻译研究的过程模式: 研究模式与方法

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在本书中的第三章至第六章中进行了讨论。

第三章作者是斯图尔特·坎贝尔 (Stuart Campbell)。作为西悉尼大学的副教授,他从1984年开始从事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曾多年担任国家阿拉伯语和英语口、笔译员的考试官和资格认定委员会成员。他对东南亚地区的译学研究及发展有着浓厚兴趣,曾出版过相关论文和书籍。

坎贝尔的论文是关于翻译研究中选择网络分析的探讨。近年来的经验性翻译过程大多采用内省式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来自心理语言学，而心理语言学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从翻译中获取语言素材。坎贝尔承认内省式的方法和以词语为主的经验性技巧有优点也有局限，他试图在此两种方法之外提出另一种研究方法作为探讨心理过程的补充方法，这就是选择网络分析法。他提出心理过程的模式可以通过不同译者翻译同一原作所得出的不同译文推断出来。坎贝尔认为选择网络分析可以用来解释具体语言的对应词情况，从而估计原文在翻译中的难度大小，比较新老翻译者在翻译策略上的差异。坎贝尔还在文中讨论了关于建立网络和线性序列的问题。

第四章为阿莉森·毕比 (Allison Beeby) 所撰。她是巴塞罗那独立大学翻译专业的教师，开设翻译理论方面的博士生课程，她也是该校翻译能力与翻译评价习得过程研究小组成员。她把对翻译能力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认为翻译能力应包括 6 种能力在内：

1. 用两种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这是指用于语言交际的知识系统和必要的技巧，如原文的阅读理解能力、译入语的写作能力。这些由语法知识、社会语言学知识以及话语能力构成。

2. 语言之外的知识，如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某一特殊领域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包括：a) 关于翻译的理论知识，b) 关于两种文化的知识，c) 百科知识，d) 专业知识。

3. 转换能力，毕比认为这是一种核心性能力，它可以整合各种能力，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本之间的转换，它把译文读者和译文目的性考虑进去，还包括能激活语言外部知识的理解意义的能力、对两种语言转换中的抗干扰能力、文本重组能力、选择最恰当的翻译方法的能力等等。

4. 职业性技能，这些能力包括作为职业翻译工作者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技巧，如善于利用不同的文献资料，应用新技术的能力，了解作品市场情况和作为翻译工作者的素质条件、特别是职业道德。

5. 心理与生理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指运用各种心理动力的能力（如读与写的能力）、认知能力（如记忆力、关注域、创造性、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分析和综合能力）和心理态度（知识好奇心、意志力、精力、批判精神、自信心等）。

6. 运筹能力，即运用策略、技能技巧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它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非自觉的，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一些能力。

第五章的作者是保罗·库斯默尔 (Paul Kussmaul)。他曾在德国美因茨大学应用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系工作, 专门从事翻译人员的培训, 也曾各处讲学, 并来过我国。他在这一章中主要论述创造心理过程的认知框架问题。他认为创造性翻译是译文“与原文相比有所变化, 即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 但它符合翻译任务的目的要求”。他认为创造性并非是非理性和前科学的神秘概念, 而是主张从认知角度来研究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运用的心理过程。他采用了菲尔莫尔 (Fillmore) 的场景与框架语义学以及原型性等概念来解释翻译创造性与适当性的产生, 同时也采用了兰盖克 (Langacker) 的形象、背景和典范性等概念, 以及尚克 (Schank) 主题组织的观点来解释创造性的技巧问题。

第六章由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翻译学与语言学讲师多米尼克·斯图尔特 (Dominic Stewart) 所写。斯图尔特原来学习意大利语言学, 并获硕士及博士学位, 近年来投身于译学研究, 他的兴趣在于翻译研究的语料库语言学方面。通过对翻译的语料库研究, 他指出译文往往比原文更依赖于语言的传统性与常规性。所以他质疑翻译过程中语料的使用从创造性和传统性的角度对译作究竟有多少影响。他指出, 翻译中的创造性与传统性主要意味着语言本身所固有的无限创造潜能, 以及我们在实际使用语言时既符合规范又不会耗尽语言的创新潜力。

三、翻译研究的比较模式: 研究模式与方法

对于翻译研究的比较模式被集中在第七章至第十章。

第七章的作者是多萝西·肯尼 (Dorothy Kenny), 她是都柏林城市大学讲师, 其主攻方向是翻译研究和语料库语言学, 曾出版过多部译学论著, 如《翻译研究的趋势》、《翻译中的词语与创造性》等等。在本文中, 她着重分析那些只出现过一次而不再重复使用的词语以及作者十分独特的用词形式 (即某种用法只见于某个作家), 她认为只有这些形式才最能体现出词汇的创造性, 也是最容易界定和利用语料处理方法从文本中检索到的。同时她还用这种方法获得词汇复现率方面的大量数据, 从而探讨某作者作品中在词语搭配方面只出现过一次的情况, 因为这种独特性也可以看作是创造性的表现。因此, 我们可以说, 肯尼所关注的不是语言的常规现象而是独特的、非常规的用法。

在第八章中, 弗代里科·扎内廷 (Federico Zanettin) 注意到运用语料库进行翻译研究的方法既有很大潜力也存在一定隐患, 所以他在使用翻译语料库时特别强调软件设计问题, 因为如何设计软件会直接影响研究的结果。

他主张建立双向平行语料库，其语料来源是英语原文与意大利语译文和意大利语原文与英语译文。在他的研究中主要讨论了如下两个问题：1) 代表性与选样标准。这一问题的困难在于两个方向的翻译数量并不均衡，如由 A 语言译成 B 语言的译本很多，而从 B 语言译成 A 语言的译本却很少，或者其文本类型大相径庭。2) 根据研究者的不同目的使用不同类型的语料和语料的多样性问题。在使用双向平行语料库中，扎内廷认为理想的语料库应是开放型的，可以允许有不同的成分。同时他还讨论了语料编码问题，其中涉及为该语料进行标注、使用共同标准对文本进行编码以及校正调整等问题。

弗代里科·扎内廷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翻译学方向的博士，现在该校弗利校区任教，其主攻方向为利用大型传媒手段进行翻译研究以及喜剧翻译。

第九章是由安娜·毛拉宁(Anna Mauranen)所撰，她是芬兰坦佩雷大学的英语教授，曾在伯明翰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她兴趣广泛，对语料库语言学、话语分析以及对比语言学和翻译研究都有所涉足。

她在此文中主要是运用对比语料库检验了翻译语言的两个假说。第一个是与原文相比，翻译显示词语非常规性的组合（搭配和多词的组合链）。第二个是在体现译入语习惯方面，通俗小说之类常见文类的翻译不如学术散文之类非常见文类翻译体现得强烈。在第六章中，斯图尔特在讨论语言使用习惯时曾强调一个事实：我们不可能穷尽语言提供给我们的句法组织的可能性。他所提出来的第一个假说的基础是，由于翻译过程的本质所在，翻译人员很可能不如直接用译入语写作时那样遵守共同选择限制的原则，他们可能会使用虽不是很典型但却也可能成立的一些组合形式。他所作的细微的量化分析显示了一个语言项明显从其一般形式演化为不同变体的事实，以及分布情况也从一般展现为各自不同的情况。这些说明译文在语言组织上远不如原文稳定。

第二个假说是非通俗性文类比通俗性文类在译文中更遵守译语规范。如果这一假说成立，就会产生译文的接受性问题以及主导语言如何影响译入语语言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将在第十二章中给予讨论，第二个方面可以参看第八章的相关内容。

金加·克劳迪(Kinga Klaudy)和克利斯廷那·卡罗伊(Krisztina Karoly)也对文本组织功能与语言特性感兴趣，在第十章中她们讨论了相关问题。克劳迪是布达佩斯大学的教授，在口译员培训中心工作，专业兴趣是篇章

语言学和翻译学。而卡罗伊在布达佩斯罗兰大学应用语言学系任教，她在该校获英语语言学博士学位。她们把重点放到了词语重复作为衔接手段的研究上，并公布了一份研究成果，旨在通过观察一些职业译者和学生们如何在翻译中以不同的方式运用词语重复，揭示出这两组在运用话语策略方面的差异。这说明重复手段在文本组织上的功能分析可以用来展示译文之间质量上的差别。这两位研究者还运用量的方法和统计法对两个小组（职业译者和翻译新手）译文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她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重复的模式可以被用来描写原文中句子与译文中句子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看出职业译者比翻译新手更能通过重复手段形成更强的语句关联性。

四、翻译研究因果模式：研究模式与方法

这一部分集中在本书最后几章中，即第十一章至第十六章。

切斯特曼在第二章中强调了认知原因的关联性的重要性。当我们利用情境性或社会文化因素来提出关于翻译特点的解释假说时，我们必须要考虑一点，即这些因素对译文产生的影响是同译者如何处理这些因素分不开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讲师恩斯特·奥古斯特·古特(Ernst-August Gutt)博士在第十一章中重点讨论了在将关联性理论运用于翻译时的认知性因果关系问题。大家知道，关联理论是斯帕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提出来的，但古特也是公认的把翻译与关联理论建立起联系的第一人。关联理论提出一个认知核心的概念，它被视作交际的中心问题，也是使跨语和跨文化交际成为可能的关键性问题。这一认知核心通常在人们潜意识中发挥作用，所以要研究这一核心，人们不仅必须研究交际现象，还要进行经验性研究，以深入到表层的下面。

最佳关联的条件一方面要求适当的上下文效果，另一方面要求加工与处理的最省力，这样才可以产生交际活动中信息、刺激和文本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因为如此，人们利用最佳关联原则来解释和预测常规情况下交际的成功或失败。具体来说就是译者可以运用它来估测他们所译材料的可达性，预测交际中存在的问题并设法将其避免。

现在人们认为翻译是一种对语言的解释活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联系在于对这两种不同文本所传达的不同解释。为了做到这一点，译者首先应了解文本原来所预期的解释。这项工作包括调查译者的认知环境是否与原作者及其读者所共享的认知环境相同，如果不同，译者则需要重建共有的认知语境，并运用关联原则鉴别哪些部分可以作为原文交际语境。在此基础上，译者还必须确定要传达原文的哪些方面，确认自己的目的在译文与

原文从零相似到完全相似过程中的哪个位置。他可以评估可传译性的条件，并设计翻译的信息意图，从而构建译入语的语言刺激方式，并使之带有引导译文读者按翻译者的意图去理解的性质。

古特在这一章中提出几个研究问题，这些问题是当使用交际的推理模式于翻译活动时就会出现。这类问题很多，从我们的能力问题到当译文语境不同于原文作者与受众所共享的语境时我们如何构建一个“人工”语境的问题等都可以包括在内。

在第十二章中，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论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翻译者的目的可以被看作是促进两种文化的长期合作，所以如何做出翻译决策完全取决于具体合作互动的情况。按照皮姆的这一观点，翻译义务论方面的问题就不可能仅限于对译文本身的研究。皮姆在西班牙洛维拉维吉利大学任教，他对翻译研究的诸多领域均有涉足，著述颇丰。他曾质疑霍尔兹－曼塔里(Holz-Manttari)关于译者是与其他专家为共同目的而工作的跨文化交际专家的说法。皮姆认为在目的不同或人们对合作这一观念有不同理解时，这一观点并无指导意义。相比之下，皮姆认为格赖斯(Grice)的合作原则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倒是更有帮助，也更有交际的社会性。但皮姆对格赖斯的这一原则也不是很满意，他认为它同样未能就共同目的的性质、相互接受以及它们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表现为对话双方的合作与不合作等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他认为无论是霍尔兹－曼塔里还是格赖斯的原则都没有对不合作的概念作出明确的说明，而且皮姆认为斯帕伯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对交际的研究以及他们对谈话人意图的关注也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它们同样是侧重对语言功能的研究而并非把语言看作是在社会交际中的一种创造性活动。

正是出于对这些理论的不满，皮姆在这一章中提出了“囚徒的两难选择”模式，这一模式是基于经济学和商谈理论用于决策过程的一种模式，它允许合作与不合作的情况同时出现。皮姆用这一模式说明通过合作可以达到双方获益的道理。同时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要建立社会关系，强调社会信任才能促进合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参与人员之间社会信任程度的不同，这一模式还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参与者不合作或许是志在更大的一种合作。皮姆特别指出，把合作原则用于译学研究，译者并不必去为跨文化交际目的确定负什么责任，事实上很可能是对翻译工作的精力付出超过所获得的利益，因而影响了合作或产生相反的效果。皮姆的这一点很有启示意义，那就是，合作是双赢的。因此，译者并不一定非

得站在哪一边。他的这一模式被应用必然产生一种伦理的结果。

皮姆还将他的这一模式扩大到语言学习及跨文化的其他活动中，他认为在这些活动中这一模式同样适用。

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任教的克劳迪娅·莫纳切利 (Claudia Monacelli) 在第十三章中对口译做了一项研究并提出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解释理论。她进行该项研究是出于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她并不想探讨译者做了些什么而是探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她认为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以数据的形式展示译者主体关于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会更好说明译者为什么采用某种翻译策略。这种自我规范性要求译者对自己的行为与选择有清晰的认识，这对同声传译的研究很有帮助。

莫纳切利认为数据收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实验活动之前的基本情况介绍。翻译者要做个人报告，介绍他们个人处理原文文本时所采取的模式，这个报告对研究不同个体的动机与表现是很重要的，这时所收集的数据具有质的性质；第二阶段是在第一个阶段基础上进行的实验阶段，即选择文本进行口译实践；第三阶段是译者与研究者对口译输出情况的监察，收集质的数据以证实研究成果。她的研究需要译员与研究者的协同工作，而且以网格状网络图式来体现研究结果。该研究让我们注意到方法上的困难，同时也强调了合作研究的价值，特别是译员本人参与其中的积极意义。

在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中，伊恩·梅森 (Ian Mason) 和塞西莉亚·沃丹斯约 (Cecilia Wadensjö) 从互动的角度讨论了对话的口译问题，他们强调了对这种特殊活动性质开展研究的重要性。梅森强调了语用学在对话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明确谈话框架所起的作用。他主张一种旨在表现“行为常规和各种特征共现”方法的研究。在这一章中，他还讨论了其他一些常见的问题。

沃丹斯约在第十五章所做的是个案研究。她是通过一次需要口译员参加的政要采访实例来分析口译活动。她指出，口译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还要协调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沃丹斯约采用分析方法研究了一次有译员参加的对叶利钦进行的电台采访活动。作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种研究探讨译员在交际互动中所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而这一任务的完成又对叶利钦的形象有何影响。

格雷厄姆·特纳 (Graham H. Turner) 和弗兰克·哈林顿 (Frank Harrington) 在第十六章中讨论了一些关于手语翻译研究的方法问题，例如使用录像资

料等。他们指出研究者应遵循职业道德原则以使被研究者的利益不受侵害。他们也强调了在社会变化中研究者的作用,以及获得被试者允许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特纳现在是中央兰开夏大学聋哑人研究中心的高级讲师,哈林顿亦是该中心的讲师,也是注册的手语译员,最近还担任了促进与聋哑人交流委员会的顾问。

仅从以上对该书的扼要介绍就足以引起我们对安德鲁·切斯特曼模式理论的浓厚兴趣,如果细读全书自然会对我们大有裨益。因为他所提出的三种模式是每位翻译实践者必然会采用、每个理论工作者也都必须思考的。正如前文所说,这些模式是每一位研究者所必须面对的,它是一种前理论准备。正因为如此,他的模式理论在西方译界影响甚广。但遗憾的是,安德鲁·切斯特曼这个名字与他的模式理论在我们国内却显得陌生。这与我国译界前一阶段在引进西方译论著作中的文献选择倾向有密切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国译界颇受文化政治领域的解构主义思潮以及文化转向的影响,所引进的译论思想也多是这一方面的,偏重于翻译的外部研究,如译者的主体性问题、文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权力话语对翻译活动的操控、后殖民时期的翻译问题、中心与边缘问题、甚至女权主义与翻译等。这些译论著作的译介,以及翻译研究的解构主义思想倾向,使得外部研究成为国内翻译研究的主流,并使国内译界误以为这也是西方译界的主流,甚至是全部内容。从此,人们不再对翻译内部研究给予关注,对语言问题也不再感兴趣,似乎这方面已经穷尽,没有再深入和发展的余地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这一部译论文集的引进,似乎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展示了与我们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情景,它关注译学内部研究,关注文本,关注语言问题,且其理论之深邃、分析之透彻让我们大开眼界。它再一次证明了翻译研究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内部研究是断不可少的,外部研究做得再好,也不可能代替内部研究。就翻译研究而言,文本与语言是中心和重点,研究方法和种种理论也应围绕它们而展开,否则译学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被消融于其他外围学科之中,成为它们的边缘性领域,甚至成为其佐证材料与副产品。这部论文集让我们把关注点重新拉回到翻译内部研究,并展示出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无限的前景。

这部论文集特点颇多,它以模式理论为核心,以对其的多元研究而广泛展开,不仅向人们说明了该理论的严密性与实践指向性,又向人们展现出其丰富的内涵与对不同视角与方法的包容性。总的看来,该书可以归纳

为以下几大特点：一、对经验性理论和实践理性的重视，强调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不着眼于纯粹的理性思辨，而突出应用性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因此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二、关注翻译活动内部研究，在翻译过程的描述与理论解释中体现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与矛盾的解决，既重静态研究又重动态研究，十分注意不同类型的翻译和理论方法的相关性与针对性。三、关注语言研究，突出其交际性，不是把语言视为存在的家园，而是视作先在性的工具，强调其规定性。重视不同语言的语言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对比与分析，并将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引入译学研究。四、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强调了理论的实践指向性与理论自身的可检验性。

上述几点仅仅是概括的总结，而绝非全部，因为该书涉及面广，为十数名各国译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每篇都有其独到之处，并非三言五语所能尽之，以上仅仅是笔者浮光掠影读后的几点个人体会，若要得其真谛还需诸君仔细研读。

吕俊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Contents

1. Shifts, But Not As We Know Them? Research Models and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Maeve Olohan</i>	1
2. A Causal Model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Andrew Chesterman</i>	15
3. Choice Network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i>Stuart Campbell</i>	29
4. Choosing an Empirical-Experimental Model for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he PACTE Model <i>Allison Beeby</i>	43
5. 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Looking at Creative Mental Processes <i>Paul Kussmaul</i>	57
6. Conventionality, Creativity and Translated Text The Implications of Electronic Corpora in Translation <i>Dominic Stewart</i>	73
7. Lexical Hide-and-Seek: Looking for Creativity in a Parallel Corpus <i>Dorothy Kenny</i>	93
8. Parallel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ssues in Corpus Design and Analysis <i>Federico Zanettin</i>	105
9. Strange Strings in Translated Language A Study on Corpora <i>Anna Mauranen</i>	119
10. The Text-organizing Function of Lexical Repetition in Translation <i>Kinga Klaudy and Krisztina Károly</i>	143

11. Issues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the Inferential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161
<i>Ernst-August Gutt</i>	
12. On Cooperation	181
<i>Anthony Pym</i>	
13. Mediating Castles in the Air	193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i>Claudia Monacelli</i>	
14. Models and Methods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Research	215
<i>Ian Mason</i>	
15. Co-constructing Yeltsin – Explorations of an Interpreter-Mediated Political Interview	233
<i>Cecilia Wadensjö</i>	
16. Issues of Power and Method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	253
<i>Graham H. Turner and Frank Harrington</i>	
Notes on Contributors	267
Name and Subject Index	271

1 Shifts, But Not As We Know Them?

Research Models and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AEVE OLOHAN

Abstract: *Using the models of translation proposed by Chesterman (1998 and this volume) – comparative, process and causal – as a means of structuring the discussion, this chapter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models and method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mployed by some of the leading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While the focus throughout is on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e objects of study and consequently th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re diverse. Some models and methods are applied to transl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hile others are more established and can be assessed in terms of their reliability and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results they yield. Issues of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ology are addressed, and interesting questions are raised which are likely to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future research, for example with regard to causal model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al ethics,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issues of power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

1. Introduction

In the terminology of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the metaphor in the title of this volume is ontological, enabling us to view activities and ideas as physical entities and thus to refer to, identify and quantify them. The natural concept of the geological fault may help us conceptualize the virtual boundary between cultures and languages – volatile and shifting – as a line along which minor or major displacement can occur, horizontally or vertically, suddenly and with drastic consequences or very gradually and almost imperceptibly.

The metaphor of bridge-building is often used to refer to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Drawing attention to faultlines may be seen as taking us a stage deeper both physically and figuratively, to the fracture in the earth's crust and the forces of compression or tension which cause one section of the crust to be displaced relative to another, with the consequences at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which that might have, from earthquakes to the formation of mountain ranges. The study of these faultlines and their effects may be to bridge-building (and tunnel-drilling) what translation research is to translation. We use faultlines to indicate the location of past, present or future displacement; the effect on the surface of any such movements might be modelled, investigated, measured, experienced, described, explained or predicted. The aim of seismological research i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